

## 論《世說新語》在古典敘事文傳統中的繼承與 演進——與《左傳》、《說苑》的比較研究\*

劉承慧\*\*

### 摘要

中古《世說新語》上承《左傳》、《說苑》等子史敘事傳統，下開「世說體」先河。本文透過比較，展現它的敘事特點。儘管體製不同，它就像《左傳》具備多重管道的敘事體裁程式；它的體製沿襲自秦漢雜家著作如《說苑》，然而敘事成就有所超越，正是因為表達多重觀點的緣故。中古的歷史書寫題材從國家大事轉向社會文化活動，使《世說》帶有鮮明的人文意趣。它以衣著和外貌勾勒人物神態，故事情節中穿插敘述者對人物心理的揣摩，成功地刻畫出動靜交錯的中古文人群像。

關鍵詞：世說新語、古典敘事文、多重管道的敘事體裁程式、歷史書寫的轉變、中古文人群像

---

\* 本文為科技部109年度計畫「《世說新語》語法修辭研究」(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07-075-)之研究成果。初稿曾於2021年5月9-10日在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所舉辦的「中國敘事學國際研討會」宣讀，承蒙講評人劉苑如教授提出具有啟發性的意見，又承蒙匿名之外審委員指教，一併致謝。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南朝劉宋時期成書的《世說新語》(以下簡稱《世說》)承襲了前代的子、史書寫傳統。范子燁 (2014: 107-111) 指出劉宋文士經常談論魏晉人物, 或者出於仰慕, 或者標舉為品評對象, 都以史實為本; 《世說》是劉義慶和幕府文士採集魏晉人物的舊聞纂輯而成, 可視為王族成員帶領書寫前朝歷史。只是學者對《世說》載錄的史事的真實性並不是沒有保留, 而所謂的「真實」近年也有比以往更深入的研究。王澧華 (2019) 指出, 劉孝標《世說注》篩揀出《世說》記載的虛謬, 有「備異聞兼究虛實」之功 (頁 42-43), 卻也有「憑空發難」之失, 某些被斥為虛謬的記載未盡切當 (頁 47-48); 他認為「劉義慶編《世說》, 樂為兩百年名流作群體列傳, 替魏晉宋名士作立體寫真, 對瀟灑風流作存記、發點讚, 是筆記體的小說家言, 即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志人體小說」(頁 41)。<sup>1</sup>

小南一郎 (2014: 33) 指出「相較於較為嚴厲的東漢, 《世說新語》所展現的人物品鑒更為靈活。其原因之一, 應該是當時的人物品鑒不奉道德基準為金科玉律, 而能從不同角度看出人物所流露的性質」。逢耀東 (1998: 15-20) 指出, 魏晉史學著作多不受官修史書限囿, 不由儒家經學的角度, 是從社會文化活動的角度記錄歷史。準此則是魏晉歷史書寫觀念的轉變帶動《世說》敘事的演進, 在新的歷史書寫潮流下, 創造新的文學。

寧稼雨 (1994: 284-289) 討論「世說體」源流與發展時提到, 按

---

<sup>1</sup> 王澧華 (2019) 不完全認可《世說注》對《世說》的糾正, 他指出「就以駁難糾謬而論, 《世說注》共 47 條, 其中以情理禮法而糾駁者即 16 條; 另有 10 條, 僅憑尊號、官職、稱謂等枝節歧異而認定『非也』、『穿鑿』, 甚至斥『謬』、斥『妄』, 不僅數量居其半, 而且立足與立論也有違於注釋原則」(頁 48)。換言之, 47 條中有 26 條不盡然能完全推翻《世說》記載的真實性。更重要的是其中涉及不同的價值立場問題, 但超過本文的論旨, 不再贅言。

照內容分門別類的體製早在秦漢雜家著作如漢代劉向《說苑》和《新序》就已經出現，《世說》應是仿照其體製書寫，門類名目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汰侈」近似「貴德」、「善說」、「理政」、「修文」、「刺奢」。<sup>2</sup> 亦即設定門類，將符合門類特性的單篇人物記載收入，例如將足為道德表率的 47 則人物記載收入〈德行〉，體現「情之放肆」的 54 則記載收入〈任誕〉。<sup>3</sup> 儘管體製上有所繼承，《世說》卻超越前文本，刻劃出充滿意趣的中古人文世界。

可見《世說》兼有史書的內容、子書的體製、文學的義涵。然而它如何超越秦漢雜家的門類書寫限制，成為獨樹一幟的志人小說？我們認為關鍵在《世說》具備單一文本表達多重觀點的敘事特性。這種特性最早見於《左傳》，儘管它是編年體史書，卻能超越編年體的限制，臻於文字藝術的高度。

第二節由《世說》和《左傳》、《說苑》的比較，從敘事體裁程式與門類書寫兩方面，辨析《世說》創造的敘事類型。我們認為《世說》就如同《左傳》具備一套多重發言管道的敘事體裁程式，由敘述者、評議者、故事人物在各自立場上表達觀點。然而兩者表達的「真實」不同，劉承慧 (2016) 指出《左傳》是利用多重發言管道揭示存於東周春秋社會的「史事真實」和「義法真實」。<sup>4</sup> 《世說》則是利用多重發言管道再現魏晉人情世界的真實。另一方面，《世說》依循前代的門類體製書寫，體製本身潛藏著建構多重觀點之敘事文本的可能，但前

<sup>2</sup> 有關中古志人小說的源流發展及特色，請參閱寧稼雨 (1994: 269-283)。

<sup>3</sup> 小南一郎 (2014) 從「才」和「情」兩方面討論《世說》肯定的人的特質，第 43 頁提到「〈任誕篇〉收集名士蔑視世間禮教的行為軼事，以看熱鬧的態度觀察超越常識的行為，除了見到情的自由表現，令人感到痛快之外，也可觀察到此書對衝破外物的限制進而展演人性的名士有所共鳴」。寧稼雨 (1994) 視之為情感寄託，指出《世說》的作者「能把自己的生活追求、審美情趣與作品中的文人相互作用，能從更為廣闊的範圍上，表現時代知識分子的面貌」(頁 272)。

<sup>4</sup> 魯曉鵬 (2012: 6) 稱之為「不偏不倚的客觀記錄」。

代的書寫目的在議論而非敘事，例如《說苑》所述人物與事件都指向特定的道理，目的是議論，<sup>5</sup>《世說》卻以此呈現敘述者、評議者、故事人物的不同觀點。<sup>6</sup>

第三節是在劉承慧 (2017; 2021) 的基礎上進一步析論《世說》中的情意表達手法與表現內容。首先簡述《世說》超越《左傳》之敘事技法，其次討論文人對大自然的情感寄託乃至藉由自然而興起的人情感懷，最後以〈賞譽〉第 17 則對人物心理的揣摩與刻劃，揭示《世說》敘事技法上的演進。

## 二、敘事中的多重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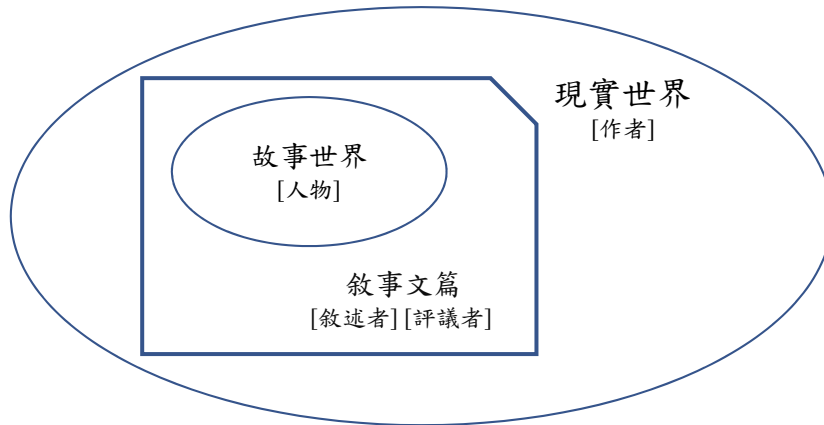
敘事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語言表達類型，敘事文的通性乃是由敘述者講述某個故事世界發生的事件，其中的人物既是事件的參與者，也是事件的評議者。基於這種特性，敘事文至少具備敘述者和人物兩種發言管道，使敘事文得以在同一個文篇中，含括不同立場的意見。敘事文跟議論文或其他表達類型的區隔就在利用不同發言管道，將多重觀點置入同一文篇。

敘述者和人物是跨語言的敘事文共享的體裁裝置，但個別的敘事傳統往往有殊異的創發。例如《左傳》除了敘述者和人物外，還有反映周代禮教規範的發言管道，劉承慧 (2013; 2016) 稱作「評議者」。魯國史官由敘述者、評議者、故事人物三種發言管道再現東周春秋社會的史事真實和義法真實，劉承慧 (2016: 112) 由下圖標示三種發言

<sup>5</sup> 更確切地說，《說苑》透過敘述人物故事證成特定的道理，與子書議論手法相同。

<sup>6</sup> 本文使用的「觀點」一詞並非翻譯自特定敘事學理論的術語。我們自認對中國古典敘事傳統的了解還很淺近，尚不足以與個別敘事學理論展開深刻的對話。本文中「觀點」一詞概括發言立場及該立場下的意見。

管道的相對位置：<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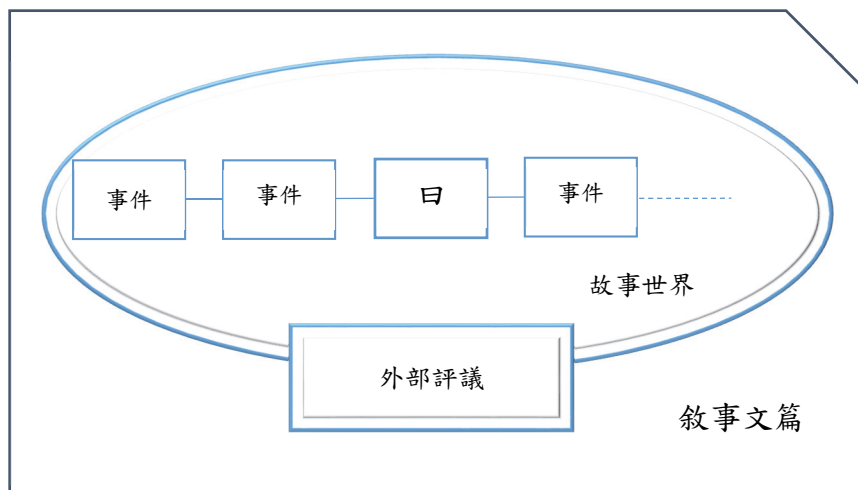
圖一：《左傳》敘事文的發言管道

圖示外圍的橢圓形代表「現實世界」，右上方缺角的方形代表「敘事文篇」，敘事文篇中的「故事世界」以現實世界為藍本，也以橢圓形標示。現實世界的作者即敘事文篇和故事世界的創造者，<sup>8</sup> 敘事文篇有敘述者和評議者，是作者為說故事和作評議設置的管道。敘述者以人物和情節營造故事世界，評議者從故事世界的外部對人物或情節作評議。《左傳》典型的外部評議是「君子曰」。儘管《左傳》記載的內容是歷史，我們仍以故事世界稱之，是表明其所傳達的史實僅止於特定觀點下的實情，而非全部的真實。

敘述者和評議者的分工方式是敘述者營造故事世界，評議者針對故事世界的局部發表特定立場的意見，兩種觀點建構的認知圖形如下所示：

<sup>7</sup> 圖一雖為引用，名稱為與圖三相對照而有所更動，發言管道亦由圓括弧改為方括弧。

<sup>8</sup> Chatman (1990: 139-160) 指出「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 本文逕稱「作者」) 創造敘事文篇和敘述者，敘述者在敘事文篇，任務是講述故事；他不在故事世界，不能夠看見或知悉故事世界的情況，只是作者說故事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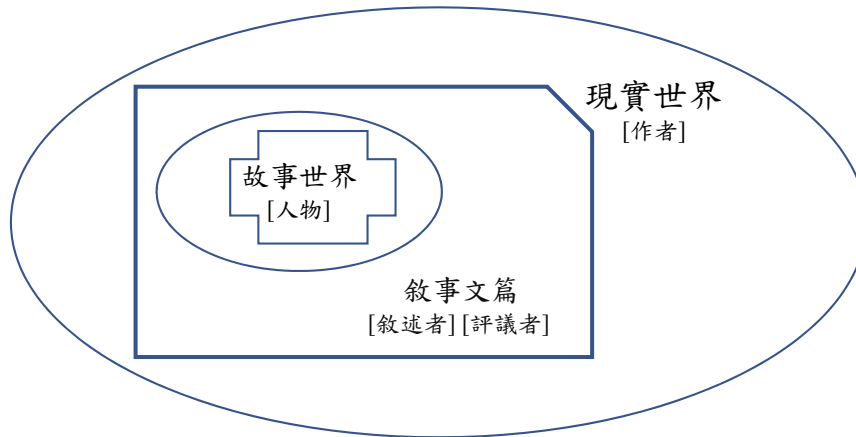
圖二：《左傳》敘事文篇中兩個相對的圖形

圖二引自劉承慧 (2016: 113)，<sup>9</sup> 橢圓形內部「事件」和「曰」（人物發言）都是組成情節的部件，形成認知上的圖形。所謂「圖形」是就「完形」(gestalt) 認知效應而言——連貫的故事情節基於「良好的延續性」(good continuation) 而獲致比個別事件或人物發言更高的認知顯著性，樹立起「圖形」(figure) 地位；<sup>10</sup> 在此同時，評議者的價值評斷加諸局部的情節，就形塑出以它為「背景」(ground) 的另一個圖形。

以上是《左傳》敘事體裁設置的發言管道，多重觀點係起自三種管道表達的內容有所出入。另一方面，《世說》亦如同一切敘事文，具備敘述者和人物兩種發言管道，加上書寫體製所設置的三十六門類反映中古士人對人的分類，為揭露社會文化意見的管道，仍是敘述者、評議者、人物並行，如圖三所示：

<sup>9</sup> 圖示名稱為與圖四相對照而作了更動。

<sup>10</sup> 請參閱 Koffka (1963: 153-154)。



圖三：《世說》敘事文的發言管道

此圖仿照圖一繪製，<sup>11</sup> 不過在敘事文篇內部橢圓形之內還有十字形，標示評議者由三十六門類將故事世界中的人物加以分類。《世說》雖為纂輯舊聞之作，但是纂輯者對前代文獻的取舍與改動展現其書寫意圖，仍以「作者」稱之。敘述者將歷史事件與人物發言編織為情節，營造出故事世界，人物發言呈現故事世界內部觀點。評議者對故事人物的分類並未覆蓋故事情節揭示的整體意義，故而十字形與橢圓形重疊卻不重合。

前面提到《世說》沿循秦漢雜家著作將人物事跡分門別類記載，門類的總數高達三十六種，分類的標準目前還沒有定論。范子燁 (2014: 39-54) 主張分類與魏晉選官制度「九品官人法」淵源很深，自〈德行〉到〈仇隙〉，每四個門類即照應九品模式中的一種品類；<sup>12</sup> 編排方式是按照儒家傳統，始於〈德行〉終於〈仇隙〉，由褒而貶逐層

<sup>11</sup> 圖三已見於劉承慧 (2021: 177)。本文為展示書寫體製上迥然不同的《左傳》與《世說》何以能夠相提並論，特將劉承慧 (2016; 2021) 繪製的圖示先後呈現，以利讀者比較。

<sup>12</sup> 三十六門類與九品模式的對應關係見於范子燁 (2014: 44) 簡表。不過兩者之間的關係其實還有斟酌的空間，詳見劉承慧 (2021) 第六節。

遞減。然而逢耀東 (1998: 9) 指出《世說》門類排序「……是依個性的轉變與發展為先後的」，〈德行〉到〈文學〉沿用孔門四科的名目，但卻承載超越四科的內容，顯示處於思想的轉變期，〈方正〉到〈自新〉十一門多少仍是以儒家價值觀為依歸，反映兩晉人格解放的過渡期，最後的二十一門迥異於儒家的個性類型，應是「魏晉思想與社會交互影響下的產物」。

寧稼雨 (1994: 291-293) 提到劉宋時期並建儒學、玄學、史學、文學，而以儒學最盛，劉義慶是皇族的成員，把儒家思想當作分類標準是自然的；不過魏晉思想歷經劇烈的震盪，已打破儒家獨尊的態勢，走上儒、道、名、法綜合的玄學道路，《世說》內容的複雜度超出儒家道德規範，終究難以避免門類名目和記敘內容的扞格。<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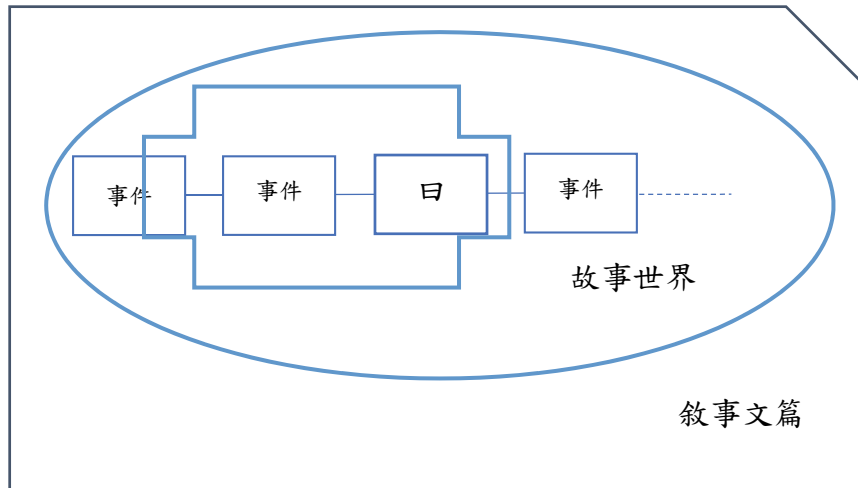
亦即《世說》三十六門類反映中古士人對人性或人品的分類觀，是魏晉玄學思潮帶來的對人文理解的轉變。但門類名目卻未必都能總括個別故事情節傳達的整體意涵。這種情形類似《左傳》表達評議者觀點的「君子曰」，多半都只能夠覆蓋故事世界的局部。<sup>14</sup> 不過《世說》評議者觀點並不像「君子曰」緊接在故事情節的後面，而是以整套分類觀覆蓋到單篇組成的故事世界。

若比照圖二的繪製方式，由敘述者觀點和評議者觀點所建構的兩個重疊而不相重合的認知圖形如下：

<sup>13</sup> 小南一郎 (2014) 指出《世說》雖編纂魏晉人物傳記，但「亦具備超越這些作品的要素」(頁 48)。例如《世說》藉謝安之口，說出《語林》、《名士傳》內容不正確，小南一郎推測編纂者對當時已有的記載不滿，「可能是因為這些作品皆將編纂重點放在『才』的部分，而劉宋時期的文人則看出這些『才』的虛偽性」(頁 50)。這裡引述小南一郎的說法，目的在顯示《世說》敘事文意義的複雜性與中古思想劇烈變遷息息相關，更提高《世說》文本詮釋的難度。劉承慧 (2021) 第七節提出一個「整體性的詮釋模式」，請自行參閱。

<sup>14</sup> 且以《左傳·隱公元年》所載「鄭伯克段于鄆」為例，外部評議「書曰」以下只針對故事世界局部，即莊公兄弟的爭奪，卻未正視武姜為關鍵角色，並未完全覆蓋故事世界的情由。





圖四：《世說》敘事文篇中兩個重疊的圖形

覆蓋在故事情節局部的十字形代表該情節之記載所屬門類加諸其上的名目。

具體而言，《世說》有許多記載，敘述者營造的故事世界實情很顯然是超過門類的名目所指：

- (1)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世說新語·賢媛》）

賈充元配李氏著有《女訓》一書，是出名的賢媛。李氏女兒是齊獻王妃子。後娶妻子郭氏的女兒是晉惠帝皇后。賈充死後，兩人都要自己的母親合葬，好幾年都解決不了，等到惠后被廢，李氏合葬的事情就定案了。李氏有才，但最後與賈充合葬，並不是憑靠她的才華，而是政治勢力——故事的內容並不是「賢媛」這個名目得以框限的。

敘事文篇中的敘述者觀點和評議者觀點各自具有認知圖形的地

位，評議是以故事情節為背景的圖形，被賦予更高的認知顯著性，其實不難從我們的閱讀理解經驗得到印證。上述記載的重點是李氏與賈充合葬的一段曲折過程，但我們理解這段過程的同時不會忘卻李氏是賢媛，除了著有《女訓》傳世，更重要的是門類名目賦予她的定位。

如果門類名目完全包覆故事情節，即如《說苑》每則記載都扣緊類目，那麼故事世界僅是就它的意涵提出詮解：

- (2)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說苑·貴德》）
- (3)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說苑·貴德》）<sup>15</sup>

例 (2) 記載晏子要用新的酒器招待齊景公，不過當他被告知必須向人民徵收才有能力備辦時，立刻打消念頭。例 (3) 記載齊桓公北伐山戎，路過燕國，燕君越出國境去迎接，他認為燕君是因懼怕而違反「非天子不出境」的規範，於是把燕君經過的地方割給了燕國，諸侯聽說後都去齊國朝覲。評議者引用《詩經》將齊桓公歸類為恭敬正直而得到上天降福的君子。

<sup>15</sup> 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原標點「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下引號位置有錯誤，按照文意修訂為「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

晏子與齊桓公的發言充分展現出「貴德」典範，個體形象顯得很模糊。《世說》承襲《說苑》體製，也有敘述者與評議者價值觀相仿的單篇，但故事情節與人物發言顯現出個體生命的意趣，自然超出門類框限。試比較：

- (4)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廡。」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世說新語·德行》）
- (5)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世說新語·德行》）

例 (4) 記載德行為士人典範的陳蕃出任太守，才剛抵達任所就打算去拜望當地知名的隱士徐穉，主簿表示大家希望他先進官署，他以周武王一即位就立刻驅車前往賢者商容的住處為榜樣，反問主簿禮遇賢才有何不可。例 (5) 記載荀巨伯去探訪生病的朋友，碰到亂賊攻城，他拒絕丟下朋友而感動亂賊，就此拯救整座城。

陳蕃和荀巨伯也是德行典範，同時具有鮮明的個體形象。陳蕃要去拜望徐穉而被主簿阻攔，他以語氣強烈的反問表態，又拿被公認為德行典範的周武王來作榜樣，彰顯此舉的正當性。反觀晏子打消使用新酒器招待齊景公的念頭，是因為得額外向人民收稅；晏子的發言旨在申論與民同樂，其實已經和備辦酒器的故事情節脫鉤，毋寧近似道

德宣示。

荀巨伯以「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拒絕朋友的好意，又在面對亂賊盤問時以「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表達赴義決心，清楚呈現個體生命對道義的堅持。反觀齊桓公瞭解燕君越境的內情後，便以割地行動謀求補救，他的發言卻未見個體生命態度——「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是回應管仲所說「非天子不出境」提出的論斷，並未顯露屬於齊桓公個人的情意。

即便《說苑》也有出示正反立場的記載，同樣顯不出個體生命的差異：

- (6)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眾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孔子曰……。（《說苑·貴德》）

周武王征服殷朝後詢問大臣該如何對待殷人，太公主張全數剷除，邵公主張殺掉有罪的人並赦免無罪的人，周公主張用田宅將他們全數安頓，不問新舊而只親近仁者，百姓犯過，是天子的責任。武王欣然接受周公的建言說「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接著「孔子曰」以下便扣住武王所說「仁而有德」繁衍出大段的議論，<sup>16</sup> 由孔子的話導入，申論仁與德，最後引用孟子的話收

<sup>16</sup> 為利於讀者檢視，將例 (6) 省略的文字補足如下：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

束，緊緊扣住「貴德」的名目。

三位大臣在不同的立場表態，傳達不同的觀點，但太公和邵公的主張與「貴德」之「德」相抵牾，打從開始就註定只是陪襯。讀者之所以無法從故事人物的分歧立場領會到更豐富的意涵，是因為「貴德」的名目確立全文的要旨，太公與召公兩人發言的內容恰正是「悖德」——當敘述者營造的故事世界只有正反意見而評議者已經肯認其中一種，那麼提出對立面的意見就只是反襯，使評議的立場更加顯豁。

這種情況不妨再拿例(1)作對照。賈充的元配李氏著有《女訓》而被歸類為賢媛，最後與賈充合葬，但敘述者營造的故事世界除上述情節外，還揭露李氏與賈充後娶妻子郭氏兩人女兒各自為母親爭取合葬的拉鋸，其意涵超出「賢媛」所指，可見敘述者觀點不受評議者觀點的限囿。

若就此區隔《世說》與相同體製的前文本如《說苑》，兩者最大的差異就在觀點的一致性。《說苑》門類、敘述者、人物三種管道秉持的觀點一致，不像《世說》三者間存在出入。此外人物發言與故事情節的密合度也不同。《世說》人物發言與故事情節是彼此接榫的，密合度很高，而《說苑》中人物發言即便與故事情節相連貫，發言內容往往是回應類目而非故事世界中的具體情事，人物的個性是模糊的。例如晏子的記載見於《說苑》多個類目，猶如王徽之的記載見於《世說》多個類目，將王徽之的記載連結起來，可以窺知屬於他的個

---

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說苑·貴德》）

體生命況味，<sup>17</sup> 但無論如何連結，都無法從《說苑》體會晏子。

多重發言管道為書寫裝置，如果透過不同管道傳達出相同立場，其實無異於單一管道的書寫——《說苑》即是如此。與此相反的是《世說》，敘述者營造的故事情節乃至人物發言呈現各式各樣的生命面貌，超越門類的價值觀。讀者因而得以領略社會文化現實以及日常生活情致。

再看一則〈雅量〉之例：

- (7)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譎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世說新語·雅量》）

此例記載謝安的姪子謝玄和王導的孫子王珉到王導的兒子王薈家去聚會。王珉很客氣地舉杯對謝玄說「奉使君一觴」，謝玄輕率地回應「可爾」，彼此間言語交際態度的不對等，激怒了王珉。謝玄少時跟隨任職吳興太守的叔父謝安，於是王珉尖刻地以「吳興溪中釣碣」譏刺喜好釣魚的謝玄，並以他的小名「羯」來嘲笑他是羯奴；謝玄還以「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之語，直呼王珉小名「僧彌」並自稱為「上國」，彰顯自己的地位高於王珉。<sup>18</sup> 那麼誰是「雅量」所指呢？謝玄地位高於王珉卻沒有因為他的譏刺動怒，僅只是以嘲弄的口吻回應——這似乎是雅量所指。然而謝玄的輩分低於王薈，在王薈家作客言語輕率，那麼王薈有沒有雅量？

東晉初期王導掌握大權，淝水戰後謝家子弟有戰功，謝玄對王導子侄的傲慢態度即是源自謝安家族地位提升。早先王導的兒子對謝家也是極度倨傲的：

<sup>17</sup> 有關《世說》所揭示的王徽之個體生命歷程的討論，請參閱劉承慧 (2021) 第五節。

<sup>18</sup> 請參閱蔣凡等 (2012: 436-437)。

- (8)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世說新語·簡傲》）

本則記載大意是謝安曾與弟弟謝萬行經吳郡，時任太守的王恬是王導之子，謝萬邀謝安到王恬家去聚會，謝安認為王恬不會跟他們應酬，拒絕前往。謝萬獨自前去，就像謝安預見的自討沒趣——「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鮮明地刻劃出王恬不屑酬酢的態度。

可見例 (7) 確實有社會背景限定的內情——東晉王謝家族成員的交往關係隨著政治勢力的消長而改變。與王恬對待謝萬的「簡傲」比起來，謝玄對王珣的態度可謂寬容，因此被歸入「雅量」。例 (8) 跟例 (7) 一樣，反映東晉權貴家族成員交往的現實，超過「簡傲」名目框限。

### 三、敘事中的情意表達

儘管《世說》分門別類的體製沿襲上古雜家著作，卻有許多名目是隨著中古社會變遷而新立的。即便某些名目與特定前文本有深厚淵源，如「德行」與《說苑》的「貴德」，但敘事技法已有重大差異。

《說苑》中的人物發言或者內容超越事件而回應門類名目，如例 (2) 中晏子的發言；或者語氣不明顯，人物形象很模糊，如例 (3) 中齊桓公的發言。前一種情況雖由引言標記「曰」將人物發言編入故事世界

中的事件序列，但是並沒有扣緊故事情節，事件與發言難以連貫成緊密的圖形。後一種情況裡發言與事件扣合為圖形，但人物個體形象薄弱，終究成為道德類型的而非個體生命的演示。可以說，《說苑》故事情節是依附在門類名目的。反觀《世說》，人物發言與事件緊密接榫連貫為有意義的整體，本身就具備獨立圖形的地位，與評議者以故事世界局部情節為背景所形成的另一個圖形在文篇中並立。可見《世說》雖然採取雜家著作體製，營造故事世界的敘事手法承襲自先秦史書如《左傳》一脈。<sup>19</sup>

不過《世說》的敘事手法比較靈活。劉承慧 (2017: 216-222) 從「動態記敘方式的演進」、「人物感知記敘方式的改變」、「人物描寫技法的多樣化」討論《世說》超越《左傳》之處。下面各引一例：<sup>20</sup>

(9)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世說新語·賢媛》）

(10)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世說新語·雅量》）

(11)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箸帽

<sup>19</sup> 事實上《說苑》也有模仿史書之處。例 (3) 引用《詩經》作評議以及例 (6) 「孔子曰」以下大段議論，都有模仿《左傳》「君子曰」的痕跡，但只是形似而已，主要原因就在人物的發言或未能緊扣事件，以致無法形成完整的圖形，或是語氣模糊，以致人物缺乏個性。

<sup>20</sup> 以下三例轉引自劉承慧 (2017: 217; 219; 222)。



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世說新語·任誕》)

例 (9) 記敘桓溫正室南康公主聽說他收李勢的妹妹為妾，帶人前去襲擊，碰巧她在梳頭，敘述者以「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所動」摹寫她的姿容以及面對突發生命威脅的反應，插入順時推進的「梳頭」、「徐曰」之間，使她臨危不亂的形象更顯生動。例 (10) 記敘免官東行的謝奉與赴任新職而西行的謝安在旅途中相遇，兩人共處了三天，謝安一直想找機會安慰謝奉，他總是把話岔開，敘述者以表示轉折的「雖」、「竟」道出對謝安深感遺憾的心理揣摩。例 (11) 記敘王濛和劉惔在桓伊家飲酒，謝尚從父親謝裒的墓地回來，是葬後三日奉神主反廟。<sup>21</sup> 眾人想邀他，一開始派遣信差去請，他沒答應但已經停車，再次去請，就把車調轉回頭。眾人到門外去迎接，他捉著迎接者的手臂下車，才剛脫掉頭巾戴上便帽就暢飲了起來，酒席到中途發覺喪服還沒有脫去。

例 (11) 並不在鋪陳一段因果變化的歷程，而是描寫謝尚對酒精的誘惑完全無力抵抗的樣子。讓我們以例 (10) 作比較。被免職的謝奉在返鄉途中遇見即將赴任的謝安，謝安想用言語去寬慰他，但謝奉不給機會，最後只能遺憾地說謝奉真是「奇士」，其中包含「相遇」、「意圖安慰不成」、「以言語自我開解」三個互有因果關係的情節區塊。又例 (9) 對李勢之妹形貌的描摹和她受襲擊當下凜然無懼的發言佔去了相當的篇幅，即便如此，從「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到「主慚而退」同樣是包含三個互有因果關係的情節區塊，亦即「公主襲擊」、「李勢之妹不畏威脅」、「公主慚愧而退」。

回到例 (11)，我們無法從事件序列拆解出因果情節區塊，原因是「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採取說明形式而非敘述形式。倘若是敘述，就應該按照時間先後把「葬後三日反哭」放到「還」前

<sup>21</sup> 請參閱蔣凡等 (2012: 910-911)。

面。成分排列順序意味著「葬後三日反哭」被用來說明謝尚何以「往尚書墓」。若或採取敘述形式，那麼酒友們在不適當的時刻引誘他喝酒，自然是建構因果情節的重要線索；既然敘述者使用說明形式，即表明因果歷程並不是重點。更重要的是，後續事件所揭示的謝尚從猶疑、忍不住誘惑、酣然忘我，到最後發現自己的行為脫序，都聚焦在個人形象而非他與共飲者互動的歷程及某種有意義的結果。

就此而論，《世說》毋寧巧妙利用門類體製，將事件敘述與人物描寫交錯地編織成一幅中古文人群像。

以上三例大略顯示《世說》在敘事技法上勝過《左傳》之處。<sup>22</sup>這幾種技法最顯著的效用就在情意表達。可以說《世說》情意表達的成就與敘事技法演進是互為表裡的。<sup>23</sup>在《世說》所揭示的種種情意之中有一種極為顯著的類型，就是如例(12)王徽之在情急中反射出來的「託言自然」，表明中古士人在精神上對自然界事物的高度依賴：<sup>24</sup>

(12)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世說新語·簡傲》）

(13)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世說新語·任誕》）

(14) 孫綽賦〈遂初〉，築室吠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

<sup>22</sup> 更多的例證請參閱劉承慧 (2017)。

<sup>23</sup> 這裡「互為表裡」源自語言形式和意義的不可切割性。表達意圖固然會影響表現形式，但詞彙語法方面的限定也是真實存在的。換句話說，所有的表達上的創發都必然是意義與形式成功配對情況下產生。

<sup>24</sup> 劉承慧 (2021) 第三節有完整的討論。

松，恆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世說新語·言語》）

例 (13) 和 (14) 同樣也顯示某些魏晉士人對自然的精神寄託。前者記載王徽之好竹成癖，即便臨時暫住的居所都命人種竹，被人問到暫住何必麻煩，他「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嘯詠」出於強烈情感的抒發，「此君」把竹子當人來看待。後者記載孫綽書齋前一棵松樹，每天親手照料，高世遠說松樹是很讓人憐愛，但不可能用作棟梁，孫綽反問，楓樹柳樹即便樹幹粗大到可以兩手合抱，又能夠做什麼用？

這種寄託往往引發更深一層的情意：

(15)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世說新語·言語》）

(16)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世說新語·言語》）

(17)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世說新語·言語》）

例 (15) 記載王胡之到吳興印渚一帶遊歷，感嘆周遭的景物不僅讓人的情緒紓解淨化，還覺得日月也清亮明朗起來。例 (16) 記載簡文帝進入華林園，跟他左右隨從說，讓人有所領略的境地不必到遠處去尋求，在隱密的林水間自然升起莊子濠、濮水邊的悠然神想，感到周圍的動物自然來與人親近。例 (17) 記載劉惔說清風朗月下，常讓人思念起許詢。

這三則記載的共通處就在自然物象喚起內心的感懷。王胡之所說

「亦覺日月清朗」是被大自然洗滌放鬆後的心理投射，與客觀上的清朗不直接相關。簡文帝所說「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同樣出於心理投射，其實有些版本作「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sup>25</sup> 似乎更具韻致，因為「覺」是單層的心理投射，「不覺」是雙重投射——發言者必得先「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即如王胡之在印渚「亦覺日月清朗」，然後才會因為「濠、濮間想」竟至忘卻其「覺」。最後，劉惔在清風朗月下經常思念起許詢，是因為他眼中的許詢形象如此。<sup>26</sup>

下面三則情景交融的記載都根源於大自然景象喚起的情意：

- (18)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謝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世說新語·賞譽》）
- (19) 袁虎少貧，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世說新語·文學》）
- (20)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世說新語·任誕》）

例 (18) 記載王恭與王忱的友情因為袁悅挑撥而生變，但王恭興致一來，仍會想起王忱。某天他行散到京口謝堂，看到晨露中才剛冒出新

<sup>25</sup> 余嘉錫 (1993: 121) 校文指出「『覺』」上景宋本及沈本俱有「不」字。

<sup>26</sup> 以自然與人物風度作比，〈賞譽〉和〈容止〉有多則記載，請自行參閱。

芽的梧桐樹，濯濯充滿生氣，於是引發對王忱的思念——「王大故自濯濯」的嘆賞可與劉惔「清風朗月，輒思玄度」互相印證。

例 (19) 記載袁宏年輕時在商船上為人幫傭，某夜謝尚官船經過，聽見商船詠詩聲，嘆賞不已，派人詳細探問，得知是誦讀者袁宏自作〈詠史詩〉，於是相邀並大相賞識。就敘述者營造的故事世界氛圍來說，謝尚當下感受到的情致或許不完全出自詩作，毋寧是詩作在清風明月下誦讀所喚起的美感經驗。

例 (20) 記載某夜大雪誘使王徽之夜半起身飲酒，吟詠左思〈招隱詩〉，忽然想起在剡縣隱居的戴逵，連夜乘船造訪，次日到戴門前隨即折返。「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表明吟詩是回應大雪召喚，意猶未足，立即採取招隱的行動，而就在他到達戴逵門前的那一刻，夜間大雪引起的情緒起伏得到了平復，於是決定折返。<sup>27</sup>

就上古到中古的散文修辭演進而言，《世說》敘事中的情意表達無疑是重大突破。遼耀東 (1998: 15-20) 指出，魏晉史學著作多不受官修史書的限囿，不由儒家經學的角度，而是從社會文化活動的角度，記錄歷史。由此可見《世說》在情意表達上有所成就，與古代歷史書寫觀念的沿革是密不可分的。魏晉史書記載社會文化活動，不僅能解釋何以《世說》體製依循《說苑》而有所超越，也可以解釋記敘內容異於《左傳》的根由。

除了像例 (18) 到 (20) 那樣藉由景物描寫刻劃人物情感外，揣摩人物心理也是很重要的演進，如下面一則記載所示：

(21)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

<sup>27</sup> 王徽之尋訪隱士的析論請參閱劉承慧 (2021) 第四節。又漢代到晉代「招隱」的流變，請參閱小尾郊一 (2014: 61-72)。

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清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世說新語·賞譽》）

此例記敘王濟對叔叔王湛從輕忽到嘆賞的變化歷程。王湛脫去為父守孝的喪服後仍留在墓地。王濟每次去拜墓，大都不探望叔叔，叔叔也不問候。偶而探望也只是寒暄。後來王濟試著問些近況，叔叔言辭之好出乎意外，讓他感到驚訝，繼續交談下去，發言轉向清微。先前王濟並沒有晚輩的敬意，聽了叔叔說話不禁生出敬畏，內心外表都嚴肅起來。於是留在那裡從早到晚地交談。他雖俊邁豪爽，也感到自己的不足，感嘆家中有名士，三十年都不曉得。王濟臨去時，叔叔把他送到門口，隨從有一匹少有人能駕馭的難騎馬，他問叔叔是否喜歡騎馬，叔叔答說喜歡，他就讓叔叔騎乘那匹馬，叔叔姿勢身形巧妙，手持馬鞭縈繞自如，知名的騎士都不及。王濟更加感嘆叔叔高深莫測，並不只是一件事而已。後來父親王渾問他何以短暫的行程花了超過一天時間，他說才剛了解一個叔叔並在父親追問下詳述原委。王渾問，跟我比起來怎麼樣？他答說叔叔在我之上。武帝每每見到王濟，就拿王湛

來調侃，問他說你家叔叔死了沒有？王濟常無話可答。其後武帝又像先前一樣詢問，他說叔叔並不傻，稱讚他真的好。武帝問可以跟誰匹敵？王濟回答山濤以下，魏舒以上。王湛就此出了名，二十八歲開始任官。

此例符合敘事文的要件。它具備不同發言管道，呈現不同的觀點，透過動態歷程及其變化結果，形塑出一個意義整體。文篇中揭示的觀點差異主要是在人物對同儕的評價。敘述者以王濟發現叔叔王湛乃真名士的變化歷程緊扣住「賞譽」名目，同時也透過故事情節揭示某些特立獨行的個體與社會群體間的隔膜，超出門類名目。

故事主軸是王濟原本對叔叔視而不見，卻在言語酬答中發現叔叔不但修辭甚好，更隨著交談越深越加清晰微妙，讓他自嘆弗如；更意外的是叔叔駕馭馬匹的能力高超，勝過知名騎士。王濟以全新的眼光認識叔叔後，改變父親和晉武帝對叔叔的誤解，遂使他在二十八歲的年紀進入官場。

我們從故事最後引述武帝「卿家癡叔死未」的調侃才曉得，王濟對叔叔缺乏敬意是因為大家都把他當作癡人。王濟最初理所當然地接納眾人的刻板印象，卻在與叔叔交往的過程中再三地被顛覆，最後出現了大逆轉，並進而化解其他人的成見。敘述者揣摩王濟心理狀態的片段如「出濟意外，濟極惋愕」、「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濟雖雋爽，自視缺然」、「濟益嘆其難測」，與事件共同在敘述軸上順時推進，繁衍出一段因果歷程，這種記敘手法不見於《左傳》。

總言之，劉承慧 (2011b: 94-104) 以句式及小句連貫方式為依據，指出《左傳》欠缺描寫。劉承慧 (2016: 106) 則引用沈玉成、劉寧 (1992: 97) 稱許〈昭公十二年〉一段記載楚靈王衣飾的說法「如此細

緻地記敘人物的衣飾，《左傳》中僅此一見」，<sup>28</sup> 印證《左傳》描寫並不發達。藉著人物舉止形貌和環境景象的細緻摹寫營造故事世界，不是《左傳》敘事的常態。

至於將人物心理穿插到敘述脈絡的寫法，正如魯曉鵬 (2012: 6) 所說的，《左傳》記事講究「不偏不倚的客觀記錄」，因此不採取透過敘述者揣摩人物心理的方式呈現。劉承慧 (2016: 109) 曾引用 Banfield (1973)，指出英語小說用「自由間接話語」(free indirect speech) 把人物內在意識 (unspoken consciousness) 穿插到情節中，突破「單一文本／單一敘述者」的侷限，是在英語語法的制約下將多重觀點置入單一文本，《左傳》利用「曰」呈現故事人物的內在意念，是先秦語法制約下的形式。<sup>29</sup>

亦即《左傳》並非沒有揭露人物內心的表達需求，但歷史書寫觀念配合語法特性使得「曰」成為當時的選擇。下面舉出一例與《世說》略作對照：

(22)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左傳·宣公二年》)

趙盾是晉靈公的正卿，靈公暴虐人民，趙盾再三勸諫，引來殺機。靈公手下刺客鉏麇在某日清晨潛入趙盾住處，發現寢室的門已經開啟，趙盾衣裝整齊地準備上朝，時間還早，坐著打瞌睡。鉏麇見此情景就走了。他認為趙盾能恭敬為國，是人民的領袖，殺掉人民領袖對國家

<sup>28</sup> 這段衣飾描寫如底線部分所示：「楚子狩于州來……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左傳·昭公十二年》)

<sup>29</sup> 詳細的討論請參閱劉承慧 (2011a; 2011b; 2013; 2016)。



不忠，然而不殺趙盾又失信於國君。無論不忠或不信，都不如死，於是就自殺了。

鉏麴在趙盾的住處歷經一番殺或不殺的內在掙扎，然而敘述者沒有直接記敘心情起伏，只由「曰」交代自我了斷的理由，<sup>30</sup> 有別於例(21) 逐步地揭示王濟內心微妙的轉變。《世說》記敘人物情意的手法超出《左傳》對客觀記錄大事的追求，自然而然地將敘事文帶往文學之路。

#### 四、結論

本文以過去對《世說》體製、成書過程及書寫性質乃至歷史書寫觀念轉變等方面的研究為基礎，推論它締造文學成就的機緣。第二節確認《世說》即如《左傳》具備多重發言管道，可以傳達不同立場對現實世界的認識。但多重發言管道只是揭示多重觀點的必要條件。我們以《世說》之「德行」門類中的兩則記載與前文本《說苑》對應門類「貴德」中的三則記載作比較，觀察如何利用門類體製刻劃真實世界。結果顯示具備多重發言管道的體裁程式不必然營造出多重觀點的敘事文篇，《世說》巧妙利用門類（評議者）、敘述者、人物三種發言管道創造出多重觀點的敘事傑作。

第三節以劉承慧 (2017) 對《世說》敘事技法的演進為起點，指出敘述者將人物舉止形貌乃至心理變化的片段夾入順時推進的事件敘述，都是《左傳》所未見。《世說》作者從文人對自然的精神寄託，繁衍出情景交融之作，更是將歷史書寫帶向文學境地的關鍵。

本文通過與《左傳》、《說苑》的比較，闡述《世說》在敘事散文

---

<sup>30</sup> 有關先秦敘事文由「曰」註記人物心理活動的討論，請參閱劉承慧 (2016: 106-107)，此外有關鉏麴發言內容所代表的意義，請參閱第 125-126 頁。鉏麴自白所隱含的內在曲折並不是由敘述者將揣摩內心狀態的片段穿插到事件敘述。

傳統的繼承與演進，提出我們近年觀察古典敘事散文流變的初步結論。我們沒有把《史記》納入是因為《史記》豐碩的研究成果中並沒有與本文取徑相同的論著，由於缺乏適當的參照，必須等到我們對《史記》的敘事特性有所掌握後，才可能合理進行比較。此外與《世說》體製相同的前文本並不只有《說苑》，本文以之為比較的對象是因寧稼雨（1994）指出《世說》若干類目與《說苑》相近，故而選取近似類目中的篇章作比較。至於其他同體製的前文本與《世說》之間的淵源，且留待日後討論。<sup>31</sup>

（責任校對：胡昭儀）

---

<sup>31</sup> 審查意見二指出「《世說》以人物為主的門類設計，更類似劉向《列女傳》以人物性行為主的分類」，確實有見地，值得日後深入論證。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宋〕劉孝標注，〔清〕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宋〕劉孝標注，蔣凡、李笑野、白振奎評注，《全評新注世說新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

### 二、近人論著

王禮華 2019.1: 39-49，〈異同與得失：《世說》與劉孝標《世說注》新論〉，《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沈玉成、劉寧 1992，《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范子燁 2014，《魏晉風度的傳神寫照——《世說新語》研究》，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遂耀東 1998，《魏晉史學及其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寧稼雨 1994，《《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劉承慧 2011a，〈先秦敘事語言與敘事文本詮釋〉，《清華中文學報》5: 45-87。

\_\_\_\_\_ 2011b，〈試論《左傳》文句、文篇與敘事文本的對應關係〉，《清華中文學報》6: 81-114。

\_\_\_\_\_ 2013，〈先秦敘事文的構成與分類〉，《清華中文學報》9: 81-121。

\_\_\_\_\_ 2016，〈論《左傳》敘事文〉，收入李貞慧編，《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詩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頁99-133。

\_\_\_\_\_ 2017，〈《世說新語》文篇析論〉，《漢學研究》35.2: 207-224。

\_\_\_\_\_ 2021,〈論《世說新語》敘事文〉,《清華中文學報》26: 169-210。

〔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 2014,《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以魏晉南北朝文學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小南一郎著,〔日〕藤奈津紀譯 2014,〈《世說新語》的美學——以魏晉的才與情為中心〉,收入劉苑如主編,《桃之宴——京都桃會與漢學新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21-52。

〔美〕魯曉鵬(Lu Sheldon)著,王瑋譯,馮雪峰校 2012,《從史實性到虛構性:中國敘事詩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Banfield, Ann. 1973. Narrative style and the grammar of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Foundation of Language* 10/1: 1-39.

Chatman, Seymour. 1990. *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offka, Kurt. 1963. *Principle of gestalt psych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三、網路資源

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 瀏覽日期: 2021 年 1 月 31 日。

##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lassical Narrative Conventions in the *Shishuo xinyu*: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Zuozhuan* and *Shuoyuan*

Cheng-Hui Liu\*

### Abstract

The *Shishuo xinyu*, which was written in the Medieval era, inherited classical narrative conventions from the *Zuozhuan*, the *Shuoyuan*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texts. It moreover set the precedent for a unique genre called the “*Shishuo* style.” The present article reveals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enre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Zuozhuan* and *Shuoyuan*. Although their genres differ,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Shishuo xinyu* possessed a multi-channeled narrative device similar to that used in the *Zuozhua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yle follows, and transcends, the *Shuoyuan* because of its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In addition, the topic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Medieval era shifted from national events to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which gave the *Shishuo* a distinct humanistic flavor that is lacking in the *Zuozhuan*. On top of its use of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the *Shishuo xinyu* describes the clothing and appearance of its characters, and reveals their mentality by way of the narrator’s comments inserted into the story line, resulting in the creation of a narrative masterpiece with interlaced dynamic and static pictures of Medieval life.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Key words:** *Shishuo xinyu*, classical narrative conventions, multi-channeled narrative device, humanistic tastes, shift of topics in historical writing